

小暑

讀享·九州



讀享   
JIUZHOU PRESS



---

---

## 精彩看点

卷首语：  
小暑，心该念之

“卢沟桥  
事变”始末

沈志华：如何看待  
中国出兵朝鲜战争

我们时代的  
精神状况

东京审判中的中国法官

《伯力城审判：沉默半个世  
纪的证言》读后感

史家龙门阵 | 蒋公的“面子”

王国维之死

树 犹 如 此  
人 何 以 堪

---

# 目 录

- 1 / 卷首语：小暑，心该念之
- 5 / 沈志华：如何看待中国出兵朝鲜战争
- 16/ 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
- 23/ 《伯力城审判：沉默半个世纪的证言》读后感
- 29/ “卢沟桥事变”始末
- 52/ 东京审判中的中国法官
- 59/ 史家龙门阵 | 蒋公的“面子”
- 66/ 王国维之死
- 76/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卷首语

小暑,心该念之



“小暑之日温风至，又五日蟋蟀居宇，又五日鹰始鸷。”

“处处闻蝉响，须知五月中。龙潜渌水坑，火助太阳宫。”阵阵蝉鸣，终于将热烈的夏日毫无遮掩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从此便无一丝凉风。

只是这热风，虽干热，但并不令人窒息，更没有78年前的那天夜晚一般凝重。

1937年的7月7日晚上，“卢沟桥事件”爆发。时空流转，《“卢沟桥事变”始末》带我们重回当时的现场，回味诸多细节，是为纪念，更为砥砺。

人是善于遗忘的动物，部分是因为生理机能，大部分则是心理故意，对于不愿接受，不敢回想的事情，索性就选择回避和强制忘记。

但是，一些历史，不仅不该回避，更要学会正视。

1949年在前苏联的伯力城，举行了一次

侵华日军细菌战的战犯审判。对于这个审判，国人知者甚少，《伯力城审判：沉默半个世纪的证言》详细记录了那场正义审判的细节。正如编者孙家红所言：我们应该学会从“拒绝遗忘”到“正视历史”。同样，民国大法官，曾参加那场世纪大审判——东京审判的梅汝璈，也在东京审判中以己身践行了诺言，“严惩战犯，慰藉同胞。”他的法袍永远如新，他的宝剑永远锋利，就像他遗留的精神，永远熠熠闪光。《东京审判中的中国法官》一文，也将带你走近这位伟大正直的法官，带你感受法庭上并无硝烟的抗争。

历史没有假如和重来。65年前的那场朝鲜战争，对于曾亲赴战场的我们的父辈而言，战争并不是“为什么，怎么样？”这般简单，而是有着历历在目的清晰感和深深的创痛。本期读享团中，沈志华先生现场答疑：如何看待中国出兵朝鲜战争，再回顾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的那段金戈铁马。这同样也是一种纪念！

习惯性遗忘，是当下这个社会的流行病。不是我不明白，只是这世界变化快。所以，才有了余世存的《人世间：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时代要承受我的白眼，审判；我也承受时代的冷淡，边缘。”这样辛辣的文笔直戳这个时代的浮华，整篇文章像是夏夜里灌下的冰镇啤酒，带着一种微醺的清醒。

小暑之日，因为历史，更成为我们的一个纪念节点。

夏天的热烈如此真实，一如历史本来的面目。让我们直面一切炽热或冷冽，一切悲欢或离合。我们让历史拨开一切多余的修饰，直呈你的眼前。



《读·享|九州》编辑部

2015年7月7日



## 沈志华：如何看待中国出兵朝鲜战争

时间：2013年3月26日 20:00-22:00

地点：北京师范大学风云论坛

嘉宾：沈志华



# 沈

志华，1950年4月出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高级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名誉研究员。研究方向：冷战史，苏联史，特别是中苏关系史和朝鲜战争。国际学术界冷战史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学者之一，其研究成果被认为达到该领域的最高水平。

## 如何看待中国出兵朝鲜战争

**现场学生：**沈老师您好，我想问您的问题是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志愿军去朝鲜了，但是现在就是有很多观点都认为中国志愿军去朝鲜完全就是一个错误，以至于在朝鲜战争中中国是负面影响远远大于正面影响。一直到现在，朝鲜战争对中国的负面影响还是存在的。请问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沈志华：**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还是站起来讲吧。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就是你说的这个观点其实我也听到过，网上也有很多。现在很多中国人认为中国出兵朝鲜是做了件错事。历史研究是这样的，一定要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当中去，来看毛泽东的这个决策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我其实写的那本书里写得非常详细，但是今天我只能简单地回答你。就是毛泽东最后决定出兵，我讲的是最后，就是最后，就是18号他决定出兵是完全是背水一战，根本没有必胜的把握。他为什么还要出兵？很可能打败仗。它是一场赌博。主要的目的就是维持中苏同盟。因为我刚才和同学讲完应该知道他和斯大林之间的信任已经完全没有了。前头发生了那么多事情，最后在关键的时候，在涉及到苏联战略意义的时候，又让毛泽东给整了一下。所以他们之间这种信任关系是完全不存在的。这也就是你看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出兵的过程中，斯大林变

来变去就是不相信毛泽东，不知道你到底要搞什么鬼。



( 1950年9月15 美军在仁川港登陆 )

那么这个别人都不知道，但是毛泽东心里门儿清，这事啊。所以他怎么才能维持住中苏同盟这种战略关系，这种政治构架，那就是取得斯大林的信任，那就是按照斯大林的要求出兵朝鲜。一旦取得了斯大林的信任中苏同盟巩固的建立起来了，中国的安全不是靠中国出兵朝鲜保障的而是靠中苏同盟条约保障的，美国就不敢有任何动作。而且国内的经济建设、国内的社会整顿的问题等等都要靠苏联帮助。我想这是毛泽东最根本的考虑，那么当然还有一个也不排除，就是这个，他也讲了很多对朝鲜的关怀呀、不忍心呀等等类似的话说了很多。如果你往后看，看到中朝之间关系的变化你就知道毛泽东是什么心态，他这个中央皇朝皇上的那个心态，就是你这个朝鲜呀，越南呀，周边呀都是我的藩属国，我都要照顾着。你有什

么难处有什么困难,那么我不能不管嘛。再加上他要做东方情报局,他一直想搞东方情报局在亚洲建立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人民阵地。所以他就不能不顾及周边的一些国家,我想毛泽东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 1 9 5 0 年 6 月 2 8 日 毛 泽 东 讲 话 )

那么我们判断一个人的决策是否正确主要是看后果,看他预期的目标是否达到了。所以,历史告诉我们他的预期目标已经达到了。第一,中国一出兵,中国和美国一打仗,25号,3天以后28号,斯大林就通知周恩来,苏联准备出动空军了。11月1号,苏联空军就上天了。从朝鲜战争开始一直到朝鲜战争结束,空战一直是苏联打的。而且在中国出兵以后,大量的苏联专家、贷款、援建项目都到了中国,解决了毛泽东的后顾之忧。战场上就不用讲了,除了60个师的现代化装备,光米德15(当时最先进的战斗机)就有300多架白给了。有人说斯大林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这个我没看到材料,但是看他这些做法,我觉得斯大林是感动的。因为他知道毛泽东是不应该出兵的,是错误的,

是错过了出兵的最佳时机，但是他还是这样做了。这个目的达到了呢。



( 当天师大的同学们很热情，入场前队伍沿着楼梯排着转了“山路十八弯” )

而第二个目的呢，也达到了，朝鲜战争中国出兵就把朝鲜的控制权交到中国手里。从甲午海战后，中国对朝鲜的控制就去了，转到日本人手里。后来转到了苏联人手里。中国出兵朝鲜后又转回来了，当然后来他又放弃了，那是58年的时候。那么从这样的判断，我们不能说毛泽东做得出兵朝鲜的这个决定是错误的，或者是愚蠢的，他有他的考虑，而且他的考虑实现了他的目的。



（从现场同学专注而开心的表情足见沈老师这次演讲的精彩）

那当然我知道所有人讲的那个中国不该参加这场战争是，因为战争的结果对中国代价太大了，损失太大，什么死了多少万人，比美国多多少。是不是？一般的考虑是这样的，但我请大家要注意一个问题：所有这些代价，这些损失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是在1951年3月份以后。因为前期中国非常顺利，前两个战役包括第三个战役几乎没怎么打，就投入了3000人左右就占领了汉城。一路打下来没有太大损失，有损失都是自己造成的，5万人非战斗减员，因为这个单衣单褂早上起来手指头冻掉了，这个腿给冻坏了。真正的战争损失并不大。所有的损失都是在第四次、第五



( 我国东北边防军守卫在边境线  
对面是战场 )

次以及后来反复的拉锯战中造成的。那么大量的损失。于是就出了一个问题，这些结果不是出兵造成的，是1951年本来能够停战而没有停战造成的。不是吗？其实我那本书里也写了，详细的没有时间讲。1951年联合国提出这个停火协议，中国完全有理由接受也完全应该接受。接受了那个停火协议对中国有百利而无一害，因为当时真正需要喘口气的不是美国，而是中国人。你看彭德怀的那个电报写的太清楚不过了，中国到51年初那仗根本没法往下打了，结果硬着头皮不接受人家的提案。坏了，因为本来这个提案是对美国不利，因为美国当时一路败退，你说在这个时候如果签了这个停火提案，而且还给中国那么多好处，说：只要中国接受提案，联合国的席位问题、台湾的地位问题、对日和约问题、什么远东安全问题一

切都可以通过政治会议解决。那就把中国摆到了一个非常有利的外交地位。所以美国一直认为这个协议就是一个投降书，绝不能签。但是不签怎么办呢？不签就是整个从联合国到所有的世界各国包括法国、英国都会把战争的责任推到美国的身上，因为美国一票否决嘛，如果美国不统一这个提案，这个提案就提交不到联合国安理会，所以得先征求美国的意见。美国就纠结了，到底是同意也不是不同意也不是，同意我真是憋了口气，而且国会肯定会反对，政府肯定会垮台；不同意你遭致全世界人民的指责，这日子也不好受。最后美国下决心赌一把，就看你中国拒绝。如果中国拒绝了，那仗接着打，屎盆子全扣你头上，结果中国真的就拒绝了。



（美军越过“三八”线继续推进）

这以后形势就大变，从外交上中国是完全孤立的，你得罪了所有的国家，政治上、经济上就实行中国全面封锁，都是在这里头，中国是侵略国家嘛，联合国



（活动结束后，沈志华与风云论坛工作组同学留影）

定为侵略国家嘛，所以全世界封锁你。然后美国，马上反击，人家可逮着借口了是你不停呀，结果中国又是战争的责任者，军事上一败涂地，外交上处于完全孤立。所以真正的错误的决策是1951年拒绝联合国提案。这个，我想，主要是胜利冲昏头脑，错误估计形势，导致这样一个结果。这才是两年多以后最后停战造成那么大损失的原因，而不是由于出兵造成的。

扫描下方二维码,阅读更多相关内容



### “读·享·团”简介:



“读·享·团”是九州出版社主办的官方读书会,以好书分享为主旨,邀请学者、名家进行读书沙龙讲座为主要活动形式,介绍好书,交流思想,倡导独立思考,不定期举办。我们会将最新活动通知,活动现场文字、图片、视频资料通过邮件的形式与会员分享,并会有不定期赠书活动。享受阅读、分享智慧,扫描二维码,一起加入九州读书会吧!



# 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

© 余世存

不要觉得一切都已熟悉,到死时抚摸自己的发肤,发生了疑问,这是谁的身体。

——冯至



(余世存)

## 2007年·深圳

**我**对前来听诗歌的朋友们说，我代表了这个时代  
的“最高精神”，只是我跟时代俗风之间相互都有敌意。

这话几乎是一句谶语。

时代要承受我的白眼，审判；我也承受时代的冷淡，边缘。

更早的时候，我写过这样的句子：我在你们中间行走，你们却看不见我。你们都背叛了我。

物质和精神的演进并不同步。在我们社会物质日益丰富的时候，精神却在极度地萎缩。意识到精神的花果飘零到个人这里，意识到文明的薪火传承到自己这里，则经历了“苦难的历程”。这个过程难为外人道。

除非不得已，没有人愿意听从这样的“天命”，因为时代社会如此“作享”。多年前写诗：“你紧闭的肉体就是我/全部的精神之谜，而精神/我们曾想象有无数可

能。”这几乎同样是诗谶：几代人青春少年时曾对精神有过无穷的想象，步入社会后只是沉溺于肉体的放纵或养生健身。

“灵台无计逃神矢。”

在“四顾苍茫一无凭借”的日子里，我几乎放弃了个人的言说，追寻起人的目的。我知道，比起时代的大V、几十万乃至百万计千万计的粉丝偶像，跟那个在绍兴会馆反思的精神一样，精神从来不是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权力和市场如无监督问责，都一样走向“劣币驱逐良币”，我们的网络或娱乐狂欢，更是跟精神相去甚远。但精神自有道义、气节、尊严。

从拒绝进入体制生活，到不出国门，到放弃以公知或贤达的形象呈堂证供，“宁将曳尾于涂中。”从发现时间空间、发现发明易经，到“温情与敬意”地看待历史，“同情之理解”时代社会。……在弃绝中、在服务中，我与时代既在实现“和解”，又在“提撕”。



## 人是目的

人的目的，在于不断地超越，正心诚意修齐治平；个人史家族史国族史人类史；如此极高明而道中庸，致广大而尽精微，尊德性而问道学。

天象会乱，秋天会有“秋老虎”，冬天会有小阳春，“残忍的”四月会有“倒春寒”；世道会乱，“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但我们人类仍会努力调时、定时，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以精神维度论，这是我们三十年来和近二百年来的多个周期的冬天，是文明世界五百年来和两千年来多个周期的中年。尼采预言过中年文明的虚无，纳博科夫形象地命名了中年的“萝莉控”和“大叔控”，弗洛伊德、斯宾格勒、布莱希特、雅斯贝尔斯、萨特、马尔库塞们看见了人的存在和时代的精神状况……现代运动以来众多的哲人、作家看到这些危难并参与到救赎之中。

我们中国人也以自省和世界眼光参与到这一运动中，从五四先贤的“国民性”到孙隆基、金观涛们的

“深层结构”，到柏杨的“丑陋”和“酱缸”……



这一本受惠于当代传播介质变化的微博体心思，算是参赞这一运动的最新作品。我要向读者朋友抱歉的是，我没能跟大家分享更系统的思考，过去的《十年书》尚不及本书的广大精微，新的言路还未成型。

让我个人略感宽慰的是，这本书断断续续写来，历时三年，几乎每天早上我都花费半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打磨几句话、一二百个汉字。因此，我是跟朋友们和社会一道，经历着考验、经历着成长。在此要提请大家铭记黄秀丽的功德，是她的辛苦努力，将一两千条散乱的微博文字编排成一个多少可观的体系。

虽然我也受着探究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生命起源、智能本质、社会转型等谜的诱惑，但自由、民主乃至安全、信赖、公益和学习等现代社会的价值仍是需要我们为之服务、献祭的，也是需要我们时时“三复斯意”的。我相信，读过本书的人，能够重温青春少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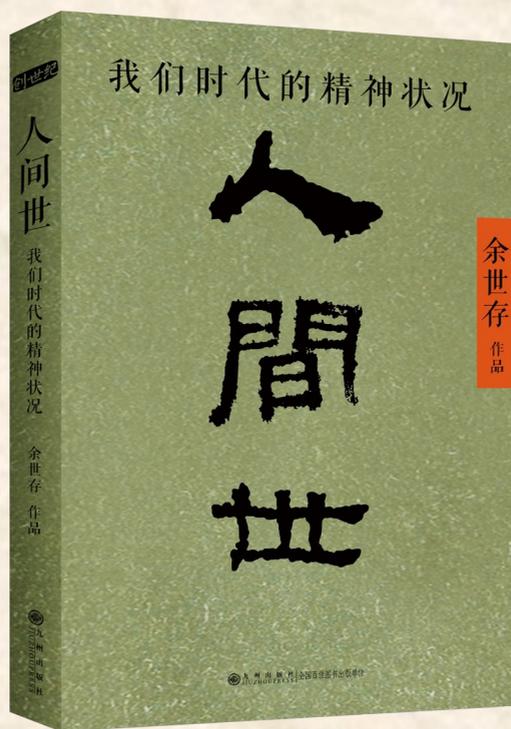
精神可能性，会理解冯至的诗：“不要觉得一切都已熟悉，到死时抚摸自己的发肤，发生了疑问，这是谁的身体。”

是为序。

JZHPRESS,悦读九州

本篇选摘自《人间世：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余世存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这是一本有趣的人情世象笔记，也是试图对世道人心做出“总体性解释”的观察思考，其中既有时代社会最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命题，又有日常生活最细小的饮食男女话题，是汉语对精神的关注、抵达和成全，是精神对庸常的安顿、命名和超越。

作者主持当代汉语贡献奖十年之久，在这个浮华的时代，作者的关怀和用心值得注意。读本书可知在社会百态的生存中坚实立足，知道我们的方向和位置，

知道人生诸种可能中的精神成就。

### 作者简介：

余世存，诗人、学者，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湖北随州人，现居北京。著有《非常道》、《非常道 II》、《中国男》、《老子传》、《大民小国》、《家世》等作品。做过中学教师、报社编辑、公务员、志愿者。曾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科学时报》助理总编辑。主持过十年之久的“当代汉语贡献奖”、现代文明人格丛书等，主编有《东方圣典》等。

扫描下方二维码，阅读更多相关内容





## 《伯力城审判：沉默半个世纪的证言》读后感

◎ 肖秋实

当初次拿到《伯力城审判》一书，首先的感觉便是惭愧。因为在此之前，我只知道二战之后有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

“五·一”长假过后，承蒙家红兄惠赠新近出版的《伯力城审判：沉默半个世纪的证言》（以下简称《伯力城审判》），并有幸成为本书的第一批读者。

当初次拿到《伯力城审判》一书，首先的感觉便是惭愧。因为在此之前，我只知道二战之后有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知道纽伦堡审判曾在法哲学领域引发自然法与实证法之争，只知道东京审判对28名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与惩处。作为一名法科生，笔者也了解到这两大审判，对于战后国际秩序规则的创制产生深远影响。然而，作为一名中国人，我确实惭愧于自己这时才第一次知道伯力城，第一次知道伯力城审判。



伯力城是汉语旧称，因为这里原本是中国领土，现为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Khabarovsk)市。1949年12月，苏联在伯力城组织特别军事法庭，审判了日军

利用中国人进行各类“活体实验”、“细菌战”的战争罪行，并遴选出12名细菌战犯，就其罪行进行公开审判。

据该书“代序”可知，本书的俄文版初版于1950年，是当时苏联国立政治读物出版局出版的官方特种印刷品，并很快被翻译成中、英、日、德等多国文字。中文版书名较长，叫《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战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自上世纪90年代，国内曾先后三次重版本书，并三易其名。及至目前，各种中文版本都已不太容易找到，1950年的中文原版就更是罕见。此次整理，不仅把几种版本进行了仔细互校，并赋予此书一个新的副标题——《沉默半个世纪的证言》。依我看，这里的“沉默”二字，在选择上独具匠心，很值得注意。



进而，我很想谈读完此书后的第二个感受：痛心。痛心于我们的健忘，痛心于为何我们集体忘却这本不

该忘却的记忆，令其沉默达半个世纪之久？而我们现在头脑中所记忆的和所接受的，又有多少内容值得留下呢？笔者平时阅读的历史书虽然不多，却很清楚一个道理：当我们集体失忆般忘却历史的来路，就不会走好未来的去路。与此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觉得，那些带有偏见的民族仇恨，很容易使爱国的行为变得荒腔走板。我们实在应该学会如何辨别历史中的真实与虚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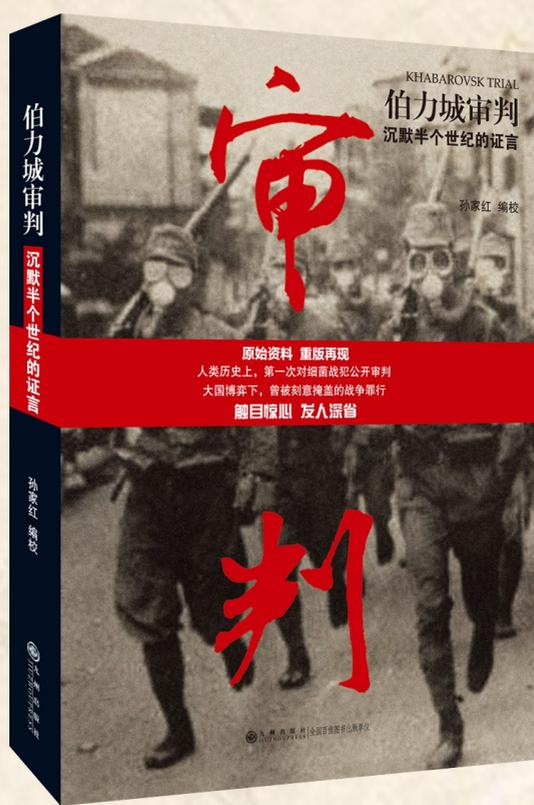
记得在《圣经》中，会有末日审判为人类辨识罪与罚。而在佛经中，阿赖耶识记录人们心念中的善恶。人类的科学经验和理性，不能对宗教的理论进行完全证伪；相反，宗教的智慧却长久指引着芸芸众生。接受审判是人的基本权利，即便是罪恶滔天的大恶人，他也有权利接受审判。史家应如同阿赖耶识一般忠实地记录善恶，镜鉴后人。所以，审判不能成为国际政治斗争的武器，善恶不能因一时之利而被歪曲。遗憾的

是，二战之后的三次审判，都被蒙上“冷战”的阴影，伯力城审判更被美国渲染成了一场“政治秀”。当然，这不是人类第一次犯下如此的愚蠢；我也相信，这绝不是中国人最后一次公开展示集体性失忆。

这本《伯力城审判》可以说是当年日军准备和使用细菌战的罪行全记录，其中充满了恐怖的字眼：“活体实验”、“鼠疫”、“霍乱”、“炭疽”。如此惨绝人寰的恐怖罪行，真令人不寒而栗。人类最基本的尊严，也早已被践踏无余。然而，从历史上看，这场残酷的战争给今天的世界留下了什么？特别是给我们中国人留下了什么？对于中国而言，似乎不应该只是民族偏见和民族仇恨，或者简单成为受害一方的道德制高点。相反，我们需要更多地从惨痛的历史中汲取教训，时刻保持警醒。

在伯力城审判过程中，如同当年的纽伦堡审判那样，服从命令成为各位战犯为自己辩护的最重要理由。可是，12名被告中却没有一人能够否认细菌战罪行的反人类本质。来自上级之命令，并不会改变人类对于正义和非正义的基本判断。政治上一时“正确”，也绝不能永远掩蔽罪恶的痕迹。

正如编者在代序中所指出，这本书的编校重版，不仅将读者前所未有地带近这段历史，“拒绝遗忘”，更在于提醒我们，应该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历史。然而，今天若要正确地对待历史，我们所需要的，可能不仅仅是求知的勇气和能力，更需要有足够的智慧和成熟的态度；否则，历史仍有可能沦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1949 年底苏联在其远东城市伯力城 (Khabarovsk) 就日军在战争期间“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 对包括最后一任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等人在内的 12 名日本战犯公开审判。这场审判首次全面揭示了日军在中国东北进行活体实验、实施细菌战争等严重罪行, 是二战后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针对细菌战罪行的国际大审判, 开创了人类公开审判细菌战争犯罪的先河, 具有重大意义。遗憾的是, 由于各种原因, 这场审判长期湮没, 很少为国人所知。

《伯力城审判：沉默半个世纪的证言》一书, 根据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 1950 年出版发行的《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中文版编校整理而成, 记录了伯力城审判全过程, 资料原始, 细节生动, 国内罕见。本次重版再现, 不仅为相关研究提供难得史料, 更切盼世人不忘战争苦难, 时刻警醒, 避免重蹈覆辙, 以进世界和平!



( 1 9 3 7 年 7 月 7 日 ， 北 平 卢 沟 桥 上 的 守 军 )

## “卢沟桥事变”始末

◎ 冯学荣

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  
事发当晚的现场，  
到底出了什么事？

1937年7月7日晚上，日本驻华北军队“中国驻屯军”的一支小部队在北平西南的宛平城外举行军事演习，其间以丢失一个士兵为借口，要求国民革命军第29军打开宛平城门，允许日军入城搜查，国军守军不从，双方开打，这一事件史称“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一般被视为抗日战争的开始点。



(1937年7月7日，日军开枪开炮猛轰卢沟桥)

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事发当晚的现场，到底出了什么事？

要讲清楚“七七事变”的来龙去脉，必须交代清楚此前在华北的日本驻军——日本“中国驻屯军”的来历。这就要从37年前的1900年讲起。

1900年，北京爆发了义和团运动。接下来，清军被八国联军打败，大清国和包括日本在内的11个国家，签署了一份名为《辛丑条约》的“不平等条约”。



(辛丑条约签订的背景图)

这份《辛丑条约》的第九条,是这样约定的:

中国国家应允,由诸国分应主办,会同酌定数处,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通道无断绝之虞。今诸国驻守之处系:黄村、郎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秦皇岛、山海关。

也就是说,大清国允许11个国家在京津一线驻军,这11个国家之中,就包括日本。

于是,日本依据这个《辛丑条约》,派兵驻扎在从天津到北京的铁路沿线一带。这支日军部队,就是日本“中国驻屯军”,从1901年开始入驻。不用说,当初日军将刺刀架到了清政府的脖子底下,这显然是粗暴侵犯中国主权的恶行。



(天津日本驻屯军兵营内部)

时光一晃,35年过去了。

时值1936年。当年的背景是,5年前的1931年,在沈阳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侵占了中国东北大地。

当时,日本正在华北地带(即北平周边)蛮横排挤国民党的力量,与此同时,北平也正在闹学潮,全国舆论呼吁抗日,华北的抗日呼声,尤其高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侵华日军集结兵力的照片)

依据《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的记载,1937年6月,日本军政界内部开始流传这样一个奇怪的传说:“(日本)中国驻屯军的参谋,正在进行秘密策划,挑起中、日之间的战争”。

日本驻北平领事馆助理武官今井武夫在其《今井武夫回忆录》中也回顾:在“七七事变”发生之前,在日本军人的圈子当中,的确有传言说:“七夕之夜,华北将重演‘柳条湖事变’一样的事变”(注:“柳条湖事变”指1931年爆发的“九一八事变”;而日本的“七夕”,则指的是公历7月7日)。



(今井武夫(右二)与随员前川冈雄、桥岛芳雄(左二)、翻译木村辰男(左一)在洽降现场)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陆军省军务课政策班长佐藤贤了在《大东亚战争回顾录》中也回忆说:当时东京传播着“第二个柳条湖事件将会于七夕在华北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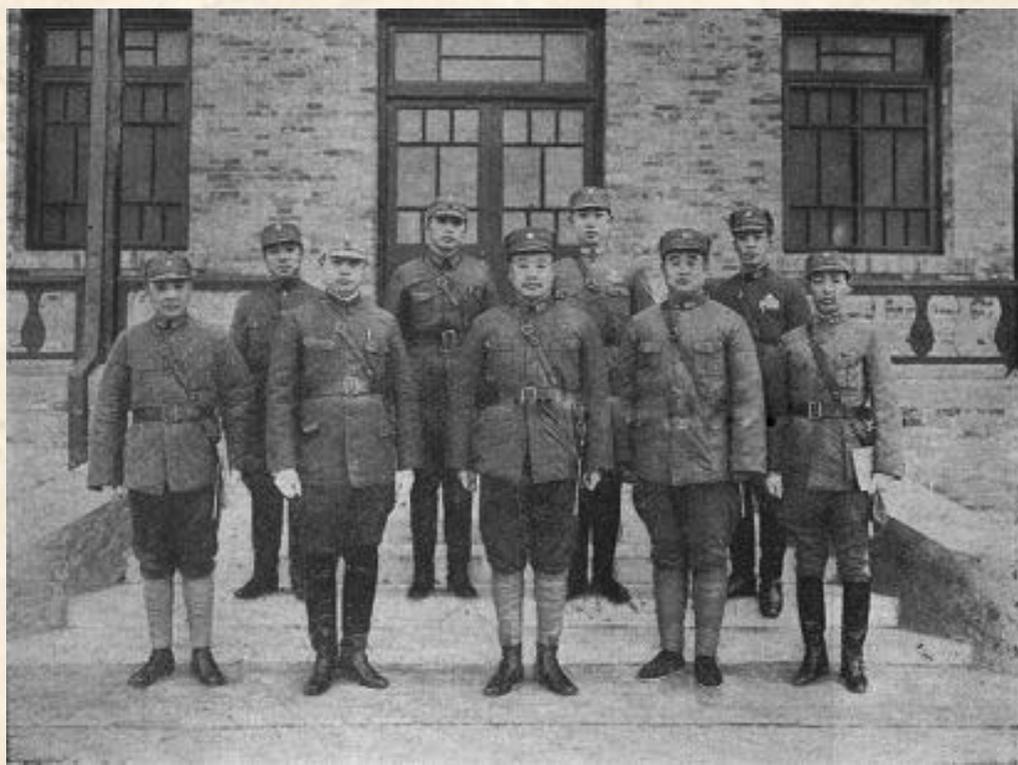
结合日本东京军部在事发之前所流传的“七夕华

北出事”的“预言”，我们不能不怀疑：日本方面有人蓄谋在华北制造事端。倘若不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巧合”，也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但是，依照今井武夫的说法，到了1937年6月底的时候，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派了陆军省军事课高级课员冈本清福来到中国华北。据说因为石原莞尔担心华北会发生像6年前沈阳“柳条湖事件”那样的事变，所以，他派了冈本清福来观察一下“中国驻屯军”的动态，以防止发生不测的事端。

值得一提的是，今井武夫还说，当时在北平的中国社区里，也流传着“七七将有大事发生”的奇怪传闻。

更玄的是，1937年7月6日的晚上，也就是“七七事变”爆发的前一天晚上，今井武夫在北平某位中国朋友家里应酬吃饭的时候，见到了当时的中国国军冀北保安司令石友三。



(1937年春，29军在北平举行军事会议，前右起：张维藩、张自忠、宋哲元、刘汝明、石友三，后右起：冯治安、赵登禹、何基津等)

石友三在席间，突然问他：“今井，今天下午3点多的时候，在卢沟桥，中、日两军之间打起来了，你不知道吗？”今井武夫说：“不可能吧！”不料，次日，就在卢沟桥这个地方，爆发了“七七事变”。

可见，若以上事实确定的话，日本军政界内部对于要否在中国华北制造事端，至少在表面上并不一致，一些人事先并不知情。

1937年7月7日当晚，驻扎在丰台的日本“中国驻屯军”小股部队，来到宛平县郊区永定河旁边的荒地上，举行军事演习。在演习过程中，日军突然听到不远处响起了十几次的枪声。



（1937年7月7日，在宛平附近进行军事演习的日军）

依据《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当时在场的日本兵清水节郎对现场的记述，是这样的：

……下午四点半钟左右……河堤上有两百名以上的中国兵，穿着白衬衣，正在构筑工事……(日军)开始演习……晚上十点半左右……突然间，从后方射来几

发步枪子弹，凭直觉知道：的确是实弹……我命令身旁的号兵，赶紧吹集合号。这时，从右后方靠近铁路桥的河堤方向，又射来了十几发子弹。回顾前后，看到卢沟桥城墙上和河堤上有手电似的东西在一闪一闪，似乎在打什么信号，中队长正分别指挥逐次集结起来的小队做好战斗准备时，听到了一名士兵失踪的报告，就一面立即开始搜索，一面向在丰台的大队长报告情况，等待指示……失踪的士兵，不久就被发现了……大队长从丰台用电话报告了在北平的联队长，接到命令：做好准备后，把卢沟桥的（中国国军第29军）营长喊出来，进行谈判……

我们从日军中队长清水节郎的回忆里可以知道，日本鬼子声称自己在演习的过程中发生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有人在黑暗中向鬼子兵开枪；第二件事，有一名鬼子兵失踪了。

中国方面，当时驻守在宛平城里的国军第29军第110旅第219团第3营营长金振中的回忆文章《卢沟桥抗敌经过》，收录在《文史资料选编》第25辑，是这样写的：

七月七日夜十时许，忽然听到日军演习营地方响起了一阵枪声。少顷……日方说他们的一名演习兵被宛平城内的中国军队捉去了，他们要进城搜查……

我们从国军营长金振中的记录可以看到，金振中也听到了日军演习营一方响起了一阵枪声。但是：金

振中所听到的这一阵枪声，是不是日本鬼子所称的那一阵枪声？就算是，这一阵枪声是不是日本鬼子自己放的？这里似乎仍然存在疑问。

那么至于那名丢失了的鬼子兵，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有一名称做“志村菊次郎”的鬼子兵，在演习的过程中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偷偷摸摸地离队了。中队长清水节郎结合“有人放冷枪”和“志村菊次郎失踪”这两件事，猜想志村菊次郎是被中国国军29军绑走，或是击毙了。于是，清水节郎立马向日军大队长一木清直报告，一木清直则报告给了位于北平城内的联队长牟田口廉也。

接到志村菊次郎失踪的报告之后，丰台日军兵营派人去搜索志村菊次郎，并大概在两个小时之后，找到了志村菊次郎。



（志村菊次郎）

但是，尽管志村菊次郎归队了，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和大队长一木清直仍然向宛平城外演习现场的中

队下令：要求29军打开城门谈判，要求对“冷枪”一事，进行解释和道歉。

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和大队长一木清直为什么要这样强硬呢？一木清直在一年之后接受日本《朝日新闻》采访，他对记者是这样解释的：



（一木清直）

我当时是接到了志村菊次郎归队的报告，但我认为还是应该坚持和中国军队交涉，否则中方会以为我们可欺。之前的丰台事件（注：一个小规模的无流血冲突）就是例子。这次毕竟是中国方面向我军开枪射击了，如果我们就这样草草撤走，那么就会给中国军队留下这样一个印象：只要向日军射击，日军就会逃跑。

当然，这仅仅是一木清直的一面之词，到底是不是他的真实想法，还是另有阴谋？笔者认为这是大大值得质疑的。

扯远了，让我们再回到事发现场。

这个时候，日军行进到宛平城的门下，敲门，要求入城。入城的理由是什么呢？找人，找刚刚点名时不见了的那位日本兵。

在此又有另一个疑问：既然失踪的鬼子兵志村菊次郎已经归队了，为何日军还要进城“搜索失踪的日本兵”？以下两个可能是最大的，第一个可能，这纯粹是借口，日军就是要闹事；第二个可能，牟田口廉也和一木清直就“志村菊次郎已归队”这个信息，对宛平城门之下的现场官兵进行了隐瞒。于是我们可以知道，这两个可能无论是哪一个，都证明了一个观点：是日军蓄意闹事。这是相当清晰、毫无疑问的。

中国守军（即国民革命军第29军）感到莫名其妙，于是打电话请示当时的北平市市长（兼第29军代军长）秦德纯。



（秦德纯）

依据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卢沟桥事变史料（上）》的记载，秦德纯当时是这样指示宛平守军部队的：

……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本军队事前未得我方同意，在该地演习，这已经是违背国际公法，妨碍我国主权。他们走失士兵，我们不负责，日方更不得进城搜查。但是，念及双方的友谊，可等到天亮后，令该地军警代为搜寻，如查有日本士兵，即行送还……

于是，第29军拒绝打开城门、拒绝让日军入城。

双方僵持到7月8日凌晨两三点钟。在这个过程中，秦德纯不断接到宛平城里的守军吉星文团长的电话。吉星文团长说：“日军的态度变强硬了，说不开门入城，就开打！”秦德纯当时说：“保卫国土，是军人的职责，打就打！”



（1937年7月8日，驻宛平县城的二十九军疾奔应战）

依据时任日本驻北平领事馆助理武官今井武夫事后的回忆，7月8日凌晨四点钟的时候，一木大队长

打电话给牟田口廉也联队长，问：“中国军队再次开枪射击，对此，我方是否应予以还击？应该怎么处理才好？请指示！”牟田口廉也联队长在电话里回答道：“被敌人攻击，当然要还击！遭到敌人的攻击，居然不知所措，还等指示，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军人？！”可见当时牟田口廉也已经明确下令日军开枪了。

实际上，此时失踪的日本士兵志村菊次郎已经归队，但是，牟田口廉也联队长隐瞒了这个事实。日方指挥官一木清直认为，既然中方开了枪，那么日本军队就不宜退却，否则日本帝国军队的尊严将荡然无存。这是日军指挥官一木清直回国后接受《朝日新闻》采访时所说的。当然，日本人所说的是不是真话，抑或仅仅是借口，那就知道了。

7月8日凌晨5点30分，日军开始炮击宛平城。



（日军炮轰卢沟桥畔的宛平城）

读者请注意一下，关于开打时间，秦德纯的回忆与此基本一致，是第二天早上的拂晓之前。日军炮响之后，中国国军第29军当即奋起抵抗。

开始抵抗后不久，国军上级来了电话，说依据日方提议，双方暂停开火，于天亮的时候开展联合调查。

7月8日早晨6时许，日方派了一名姓“樱井”的代表入城，提出了以下的要求：

1. 宛平城内的中国驻军撤退10华里，容许日军进城，搜查丢失的士兵。
2. 中方赔偿日方损失。
3. 严惩祸首，至少处罚营长。

国军谈判代表金振中当即驳斥道：

1. 日军在丰台的兵营，离这里有八里之遥，你们偏偏来到我们的警戒线演习，用心险恶。
2. 你们丢了兵，与我们无关。
3. 你们炮轰宛平城，你们才是祸首。

谈判持续到上午9点多钟，日军的炮弹突然又打了过来，炸得整个会议室四处烟尘弥漫。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当然谈不拢，双方就不谈了。于是，继续接着打。



( 7月8日，日军占领卢沟桥南端。图为日军庆祝占领卢沟桥 )

到了下午两点钟，日军联队长派人送信来了，提出要求如下：

1. 将日方代表樱井放回。
2. 中国军队于下午5点之前撤出，日军进城搜查失踪的士兵。

金振中回复如下：

1. 中国军人与宛平城共存亡。
2. 樱井也愿与宛平城共存亡，望你们不要顾虑。

7月8日傍晚7点多钟，今井武夫急急忙忙找到国军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并由赵登禹引见北平市市长秦德纯。今井武夫和秦德纯进行了协商，协商的结果是，双方一致同意：“事情不扩大”。但是，在具体措施方面，又拿不出什么好办法。

直到7月9日凌晨3点钟，中、日两军才达成协议：“以永定河为界，双方在早上5点钟的时候，同时停战，

并同时撤军。”

依照《文史资料选编》第二辑中王冷斋的《卢沟桥事变始末记》一文，7月9日上午4点钟，河北省行政督察专员兼宛平县县长王冷斋接到北平打来的电话，说日本松井机关长来称：“失踪的日本兵已经找到，现在可以和平解决，双方商定停战条件如下：双方立即停止射击；日军撤退至丰台，我军撤向卢沟桥以西；城内防务除了宛平城原有的保安队之外，由冀北保安队担任，人数限于300。”

撤兵完毕之后。日军旅团长河边正三要求允许他率领徒手幕僚进入宛平城慰劳中方人员。河北省行政督察专员兼宛平县县长王冷斋谢绝了。日方则派了外交人员笠井顾问、广濑秘书、爱泽翻译官三人带了香槟酒进入宛平城，表示庆祝和平实现之意。



(1937年7月，宛平县县长王冷斋(中)举行记者会，说明日军攻击卢沟桥的情形)

7月10日，今井武夫接到东京发来的指示。于是，他和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商量后，向中国国军

第29军提出了以下的要求：

1. 中国国军第29军向日军道歉，处分肇事者，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

2. 今后，中国军队不得驻屯在永定河东岸。

3. 日方认为，“七七事变”是由国民党蓝衣社、共产党以及抗日团体所挑起的，故应彻底取缔以上各团体组织。

中国方面派了国军第38师师长张自忠来和日军谈判。张自忠说：“国军从卢沟桥撤兵以及惩罚肇事人，这两点，有困难，办不到！”于是，没能谈出一个结果。

10日，从上午8时开始，双方又开打，一直打到下午1点钟，双方将士均疲惫不堪，开始对峙。

10日当晚7点半左右，永定河西岸的中国军队向卢沟桥东面的日军部队开炮。日军则夜袭龙王庙，占领了该地和东辛庄，但是日军伤亡很惨重。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地龙王庙)

当天夜里，今井武夫又去找了张自忠谈判。张自

忠说：“中国军队撤兵？办不到。但是，我们可以这样办：叫别的国军来换防。而至于‘惩处肇事人’这一条，我们实在是做不到的。”谈判仍然没能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7月11日凌晨两点，双方继续激战。

11日上午，北平市市长秦德纯给日本松井特务机关长打电话，说：“就算我们同意其他的条件，那个叫我们国军撤出卢沟桥的条件，也是绝对不可能同意的！”至此，双方的交涉进入僵局。



（坚守在卢沟桥头的中国士兵）

7月11日上午11点半的时候，今井武夫找了冀察政务委员会的齐燮元。齐燮元说：“我们国军撤出卢沟桥让日军去占领？那岂非我们就失去了立场了？”今井武夫于是决定让步，他说：“要么，这样吧，你们中国国军撤出卢沟桥，则我们日军在签字的同时，立即也从卢沟桥周围撤军，如何？”齐燮元说：“好！我相信你今井武夫的人格，方案全部同意！”于是，齐燮元当

场在纸上写下以下的撤军草案,双方都签了字:

1. 中国国军以地主身份,对日军表示遗憾,并将惹事的部队长官进行处分,也就此声明,将来负责防止再发生此类事件。

2. 为了避免中、日两军在丰台驻军位置过于接近,容易惹起事端起见,中国国军不再驻军于卢沟桥城厢,而以保安队来维持治安。

3. “卢沟桥事变”,是由蓝衣社、共产党势力所引起,并有抗日团体的嫁祸,故将来应彻底取缔他们。

不料,也在同一天,日本内阁在东京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向华北紧急增兵的决议。

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在其回忆录《日本政界二十年》中,这样回忆:

……言及卢沟桥事变发生时之情况,军部根据“华北发生叛乱,为保护侨民,请求派兵”之报告,要求出兵费,既以保护侨民生命财产为名,则政府对此一切均不能反对。继之,战火燃及上海,复如法炮制……

近卫文麿作为历史当事人,在回忆录里说他派兵的本意是为了保护日本侨民,这显然是他的一面之词。

依据今井武夫的回顾,“日本内阁这次决议之前,没有咨询过‘中国驻屯军’以及日本驻北平领事馆武官的意见。因此,内阁的这个决议是很鲁莽的,它造成了接下来的严重的后果。”

7月17日,蒋介石发表了抗战演说,说:“……中国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要全面奋起抗日……”。



(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演)

而恰恰在同一日,日本内阁又提出了以下一套新的解决事变的追加条件,要求日本“中国驻屯军”转达给中方:

1. 中国国军第29军军长宋哲元正式向日方道歉;
2. 中方免除冯治安的军职;
3. 中国军队撤出八宝山附近;
4. 在7月11日(今井武夫和齐燮元)签署的协议上,由宋哲元补签名字;
5. 在7月19日之前,要履行上述全部条款,否则,日军将对中国国军第29军进行讨伐。

日本的反应,使蒋介石对中日和平感到了绝望。7月22日,蒋介石派代表熊斌到北平,要求宋哲元奋起抗日,不要再对日军进行妥协。

宋哲元的应对方针是——打打,停停,看看。因为南京国军(中央军)的援军还没到达北平。



(驻守北平及其附近的宋哲元二十九军，  
图为宋哲元等人在检阅部队)

7月26日，又发生了“广安门事件”。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卢沟桥事变史料(上)》收录了当时在广安门城楼上的国军团长刘汝珍的回忆，“广安门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

7月26日下午，日军将领佐藤茂来到广安门，对中国国军的刘团长说：“我们日本军只有70—80个人，想进入北平城里面观光一下，请你们行个方便，给开个城门。”刘团长对他说：“欢迎贵军，来了我们一定开城门。”佐藤茂信以为真，就回去带兵来了，一共带来了五百余个日本兵。可是，等他们靠近广安门城门时，刘团长突然下令开枪，打得日本兵哭爹喊娘。其中，佐藤茂负伤后，被我军斩首。此战一共打死敌兵30余人，打伤80余人。

于是，战事变得不可收拾。7月28日，日军开始猛攻南苑地区。为了让古都北平不遭受战火的蹂躏，29日凌晨，北平城内的所有的中国守军，全部撤走。



( 1 9 3 7 年 7 月 2 9 日 ， 北 平 沦 陷 ， 日 军 进 入 北 平 正 阳 门 )

不久之后的8月13日，上海爆发了淞沪战役。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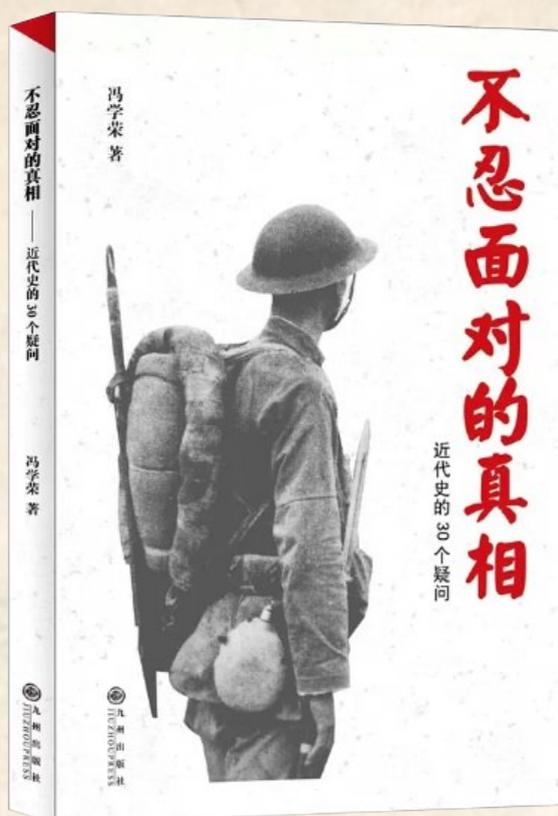
“卢沟桥事变”的基本事实经过如上。我们事隔77年回首往事，从事件的整个经过来看，不难得出结论——在整个卢沟桥事变过程中，侵华日军的态度始终是咄咄逼人、霸道蛮横的，挑起战争的主要责任，明确在于日方，这是毋庸置疑的。

同时我们也看到，77年前，在面临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第29军的爱国官兵，其抗日斗志是何等高涨，其民族气节是何等坚强！谨以此文，缅怀先烈。

选摘自《不忍面对的真相》

冯学荣著

九州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



## 内容简介：

作者从中国近代史中找出30个事件，以凿实的第一手史料为证据，刨根问底，去伪存真，回归常识，澄清历史迷雾，还原历史真相，披露了很多不为人知的史实。作者娓娓道来，观点新颖，通俗易懂，既戒除了学术著作的艰深枯燥，也避免了戏说历史的轻浮失真，适合目前大众历史阅读趋向。

## 作者简介：

冯学荣，近年来声名鹊起但又颇具争议的独立学者，著有《日本为什么侵华：从甲午战争到七七事变》《亲历北洋：从共和到内战1912~1928》《原来如此第2辑：清同治以后150年中国底本》等。



## 东京审判中的中国法官

孤寂的大法袍——梅汝璈

◎徐百柯

梅汝璈拔剑出鞘, 动情地表示: “戏文中常有‘尚方宝剑, 先斩后奏’。”

# 梅

汝璈拔剑出鞘，动情地表示：“戏文中常有‘尚方宝剑，先斩后奏’。如今系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雪我心头之恨。……对这些战犯必予严惩，非如此，不能稍慰千百万冤死的同胞。我既受国人之托，定将勉力依法行事，断不使战争元凶逃脱法网！”

有天晚上，北京顶银胡同停电。梅汝璈枯坐在家中吱吱作响的藤椅上。黑暗中，他轻轻地哼起了清华学校早年的校歌：

“西山苍苍，东海茫茫。吾校庄严，岿立中央。东西文化，荟萃一堂……”



这一幕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初。今天，梅汝璈的儿子梅小璈回忆自己的父亲时，一下就想到了这一幕。他对记者谈起父亲的晚年时，有些唏嘘。他用了这样一个形容词：“孤寂”。

梅小璈说，虽然上世纪60年代初，父亲尚不足花甲之年，可他心知肚明，属于他的那个“东西文化，荟萃一堂”的时代已经逝去了。

新中国在学科建制上完全照搬“老大哥”苏联，全国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所大学保留了法律系，且讲授的内容都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法学。这让毕业于清华学校、留学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在芝加哥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的梅汝璈常常感到无所适从。他努力按照党对“旧知识分子”改造的要求，虔诚地学习俄语，试图不被形势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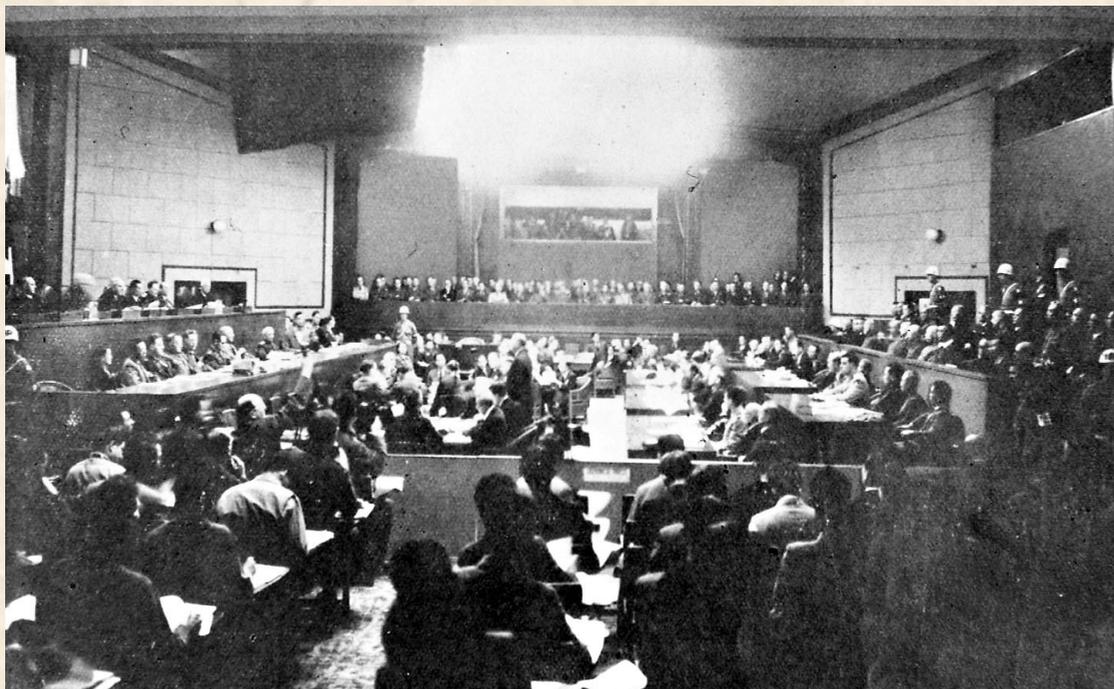


据梅小璈说，现在他家还能找到父亲当年抄写俄文单词的小本。在苏联法学教材上，还有父亲留下的铅笔批注。作为一个留美法学博士，梅汝璈曾执著坚持的那些法学信念渐渐失去了依托——三权分立；

司法独立……这是法哲学奠基人孟德斯鸠奠定的理论，又在杰斐逊等人的实践中加以完善的。

显然，这一切已不合时宜。“文革”中，梅汝璈在一份“检查”里写道：“我实际上只是一本破烂过时的小字典而已。”

“其实，他个人的小环境还是不错的，起码在物质上。如果以季羨林的《牛棚杂忆》为参照系，他并没有受太大的罪。”梅小璈在解释父亲晚年的孤寂心境时如是说，“但他的学科没有了，他的学术没有了。”



在那个年代，“梅汝璈”三字变成一个空洞的符号。充盈其间的，不是这个人的赤子情怀和渊博学识，而是一个随“形势”沉浮的抽象指称。有研究者曾这样评价这位外交部前顾问：“梅汝璈名字出现的频率和受关注的程度，基本上是中日关系的晴雨表。”在上世纪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初，一旦中日关系出现“问题”了，他就会被邀请出面撰写文章；而中日关系“良好”时，他的名字则不愿被各方的人们所提及。但梅汝璈注定名垂青史。这位晚年“孤寂”的大法官，

曾书写过现代中国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1946年3月19日，受命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博士离开上海，远赴东京。当日，《中央日报》等中国最权威的媒体，同时在显著版面刊出标题：“清算血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官梅汝璈今飞东京”。



东京帝国饭店，盟军最高统帅部中国联络官为梅法官举办接风宴会。宴会上，时任国民政府教育次长兼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的顾毓琇，将一柄装饰华贵的宝剑赠予梅汝璈。梅汝璈深深鞠躬，双手过顶接剑。他说：“‘红粉送佳人，宝剑赠壮士’。可惜我非壮士，受之有愧。”顾毓琇说：“你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和千百万死难同胞，到这侵略国的首都来惩罚元凶祸首。天下之壮烈事，以此为最。君不为壮士谁为壮士！”

听罢，梅汝璈拔剑出鞘，动情地表示：“戏文中常有‘尚方宝剑，先斩后奏’。如今系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雪我心头之恨。……”

对这些战犯必予严惩，非如此，不能稍慰千百万冤死的同胞。我既受国人之托，定将勉力依法行事，断不使战争元凶逃脱法网！”



这位“壮士”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在这场历时达两年半之久、人类司法史上所罕见的大规模审判中，受审的28名日本甲级战犯，除两名病死狱中，1名因精神病终止审判外，东条英机、广田弘毅、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武藤章、木村兵太郎等7人被判处绞刑，梅津美治郎等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判处有期徒刑者2人。

今天，由梅汝璈亲属捐赠的东京审判判决书底稿和梅汝璈当时身穿的法袍，已被收藏于国家博物馆。

这位慷慨激昂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大法官，曾经的一席话至今在我们耳边徘徊不去：“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本篇内容选摘自《民国风度》，

徐百柯 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扫描下方二维码，阅读更多相关内容





## 史家龙门阵 | 蒋公的“面子”

◎ 杨天石

他与邵力子谈话，强调“革命以集中与统一为唯一要件”。不久，他即派邵力子赴苏，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要求共产国际承认中国国民党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

# 孙

中山在世时，国民党内部在联俄、容共等问题上，即有不同意见。孙中山去世后，迅速形成对立的两派，通称左派与右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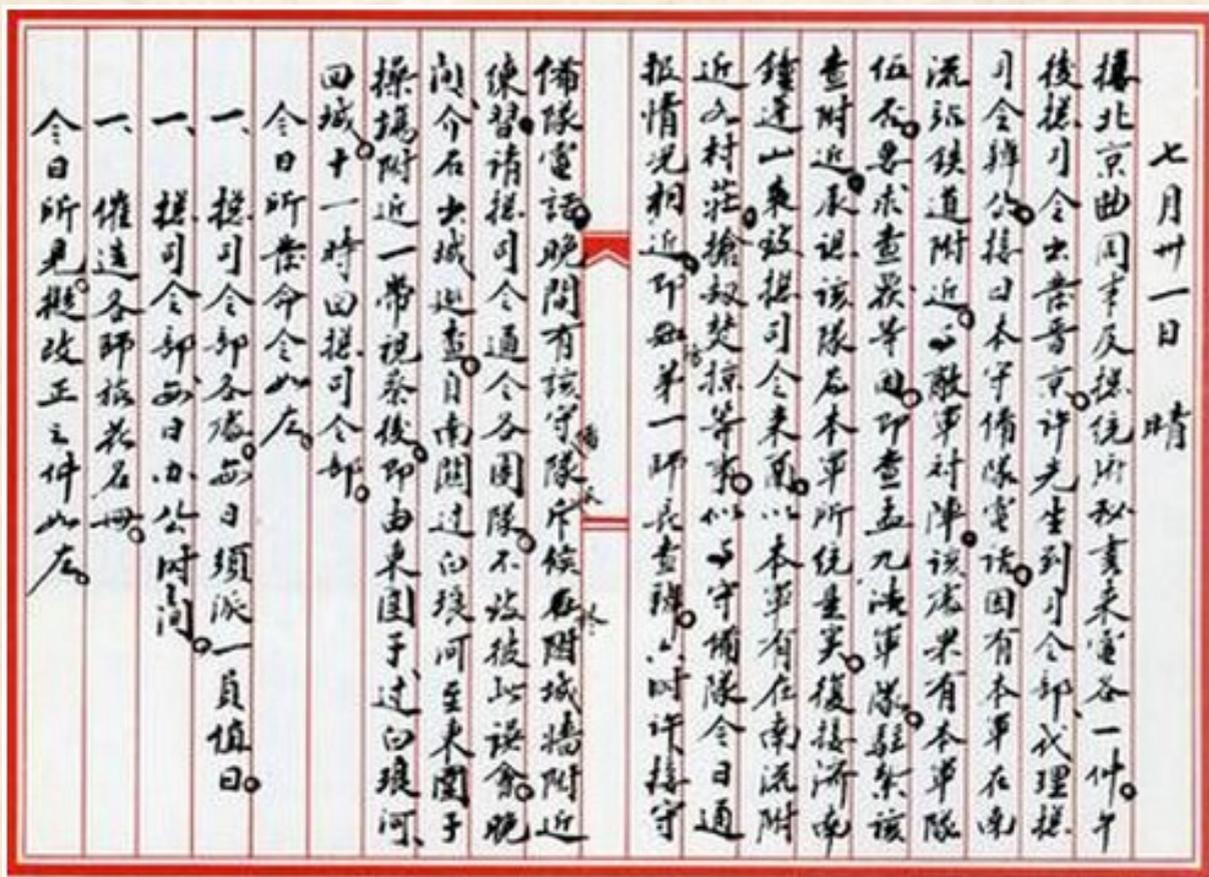


蒋介石最初站在左派方面。1925年11月23日，林森、邹鲁、谢持等在北京西山召开会议，通过《取消共产党员国民党党籍》、《鲍罗廷顾问解雇》等案。12月24日，在上海另立中央。同月下旬，广东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的王柏龄等人准备示威响应。28日晚，蒋介石从汪精卫处得到有关消息，当日日记云：“王柏龄糊涂至此，可恶殊甚，严电阻止，不知有效否？”

当时，蒋介石反对在军中形成派别。1926年1月2日日日记云：“下午，对各将士痛诫派别之恶习，不禁泪下。”当时，在黄埔军校中，与孙文主义学会对立的是左派组织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2月2日，他约孙文主义学会与青年军人联合会两派干部开联席会，限令高级

官长退会，同时要求双方干事互入两会，企图消弭二者之间的界限。4月，又进一步要求两派组织同时取消。

“三·二〇”事件后，右派纷纷做蒋介石的工作，企图争取他站到自己一边。4月3日，刘峙、古应芬、伍朝枢三人陆续见蒋，进行游说。蒋介石日记云：“右派徒思利用机会，联结帝国主义以陷\*，甚可叹也。”同月5日，宋子文向蒋介石反映，广州右派计拟召开市党部大会，举行示威，蒋介石立即函广州公安局长吴铁城，加以制止。次日，蒋介石并通电反对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表示“誓为总理之信徒，不偏不依，惟革命是从。凡与帝国主义有关系之败类，有破坏本党与政府之行动，或障碍我革命之进行，必视其力之所及扫除而廓清之。”



蒋介石反对右派的立场一直持续了很久。北伐期间，樊钟秀一直在河南南部活动，组织军事力量，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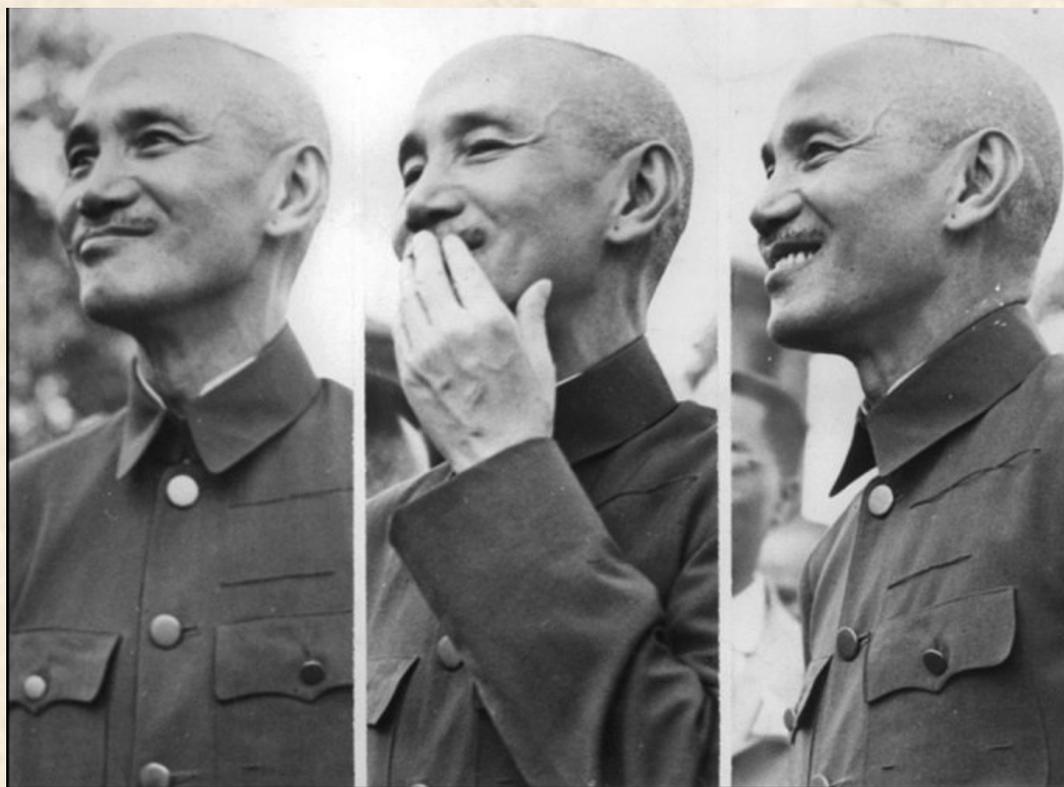
图响应北伐。1926年8月，蒋介石听说居正、谢持有离间樊钟秀等与北伐军的打算，愤怒地在日记中写道：“彼等诚反革命矣！”<sup>②</sup>同年9月16日，蒋介石会见田桐、周震鳞后，在日记中留下了“其语不堪入耳”的记载。



不过，由于蒋介石在联俄、容共问题上和西山会议派的观点有相通之处，因此，最终必然会走到一起。1926年5月22日日记云：“总理责任交给国内青年，愿以奋斗之青年赞成国民党，然而非欲党员对三\*义疑为不澈底之革命也。如言不澈底，则俄国革命迄今仍未澈底也，不革命一语，为宣布革命党员之死刑，闻者无不反对，革命必致破裂。应联合革命的新旧党员对外也。”这段日记，已经预示着他和西山会议派矛盾的溶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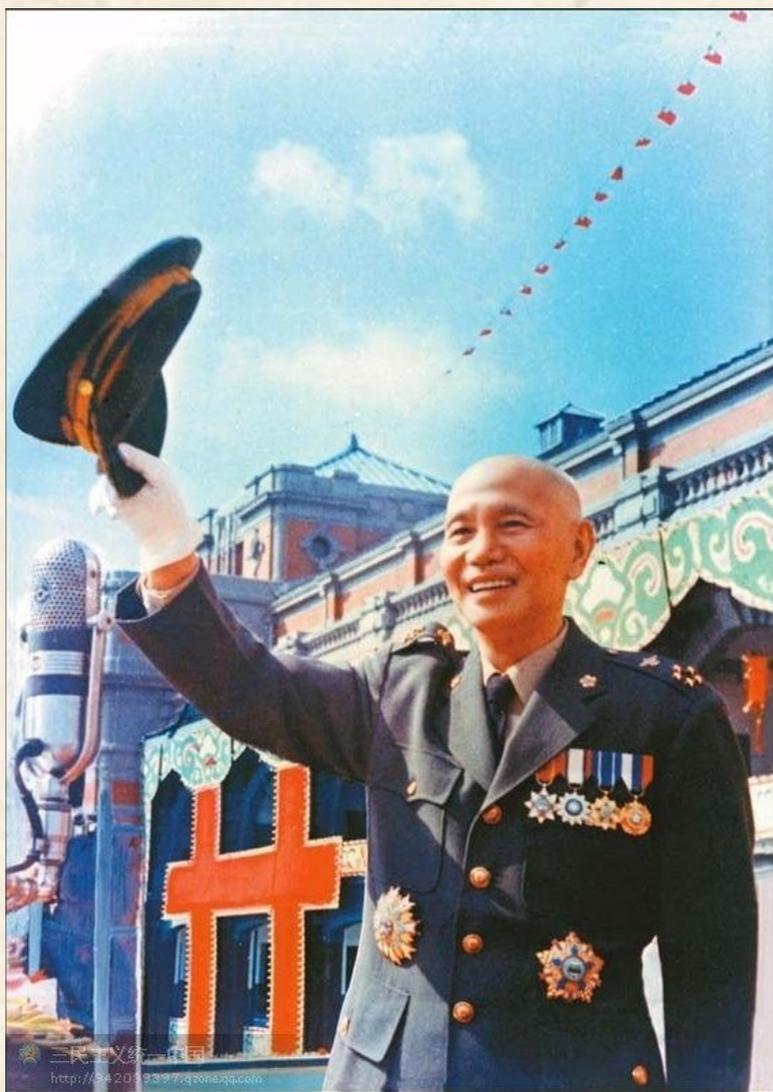
## “一个主义，一个党”

1923年，蒋介石访问苏联，原拟请苏方支持国民党人在蒙古的库仑建立军事基地，遭到拒绝。他满怀期望访问苏联，却没有得到什么具体成果。但是，他却总结出了一条经验——必须独立、自动、不受外人支配。



蒋介石在访问苏联时，遇到过一个名为赵世贤的中国青年，相谈融洽。离开苏联时，蒋介石又和这位年轻人作了一次谈话：“略述此次来俄经过情形，戒其毋为外人支配。”此后，蒋介石即力图摆脱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控制，并力图和左派及\*争夺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1926年3月8日，蒋介石与汪精卫商决“大方针”。蒋称：“中国国民革命未成以前，一切实权皆不宜旁落，而与第三国际必能一致行动，但须不失自

动地位也。”同月30日，又在日记中表示：“只要大权不旁落外人之手，则其他事皆可迁就也。前日政府事事听命于外人，以致陷于被动地位，此非外人之故，而精卫自让之也。”5月21日日记再云：“革命须求自立，不可勉强迁就。世界革命应统一指挥，但各国革命政权仍须独立，不能以用人行政亦受牵制。”这时，蒋介石孜孜以求的是他能独立自由地处理中国革命的各种问题。当年12月，蒋介石听说托洛茨基将要出使中国，将希望寄托在他身上，29日日记云：“党务、政治不能自由设施，则胜无异于败也，托氏来华，或能改正，而本身应具独立之心也。”



蒋介石的苏联之行还使他得到了一条经验，即革命必须由“一党来专政和专制”。他开始致力于“一个主义、一个党”宣传和努力，并以此为指针，处理国民党

内的左右派纷争。1926年6月7日，他在黄埔军校发表演讲称：“俄国革命所以能够迅速成功，就是社会\*党从克伦斯基手里拿到了政权……什么东西都由他一党来定夺，像这样的革命，才真是可以成功的革命。我们中国要革命，也要一切势力集中，学俄国革命的办法，革命非由一党来专政和专制是不行的。”同月26日，他与邵力子谈话，强调“革命以集中与统一为唯一要件”。不久，他即派邵力子赴苏，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要求共产国际承认中国国民党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

JZHPRESS

本篇内容选摘自《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还原13个历史真相》，

杨天石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扫描下方二维码，阅读更多相关内容





## 王国维之死

◎周言

1927年6月2日，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王国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悲剧性人物，他的悲剧部分源自其个性，部分源自他所身处的清末民初的“转型时代”。

## 死前的镇定

现 今人们已经无法具体考证王国维从何时决意赴死，但是王国维赴死之前的镇定，却是绝大多数人的共识，这其中一个重要的细节，乃是王国维死前和谢国桢的一番对话。

据谢国桢事后回忆，在王国维逝世之前的六月一日，他因友人所托，请王国维书写扇面两页，其一已送给友人，谢国桢存留其一。当王国维写扇面时，将桢之名误写为兄，王国维赴颐和园后，又返校园办公室用墨笔涂改“兄”为“弟”字，然后又进颐和园鱼藻轩前从容投水。

这个扇面上所写的是唐末韩偓所作的七言律诗二首，头一首题目是《即目》，亦作《即日》；第二首题目是《登南神光寺塔院》。王国维同时给赵万里写的扇面诗的内容一样，但是题目却署的乃是《玉山樵人诗》，王国维同时附注：“樵人诗出于玉山，神味相似，而风骨转遒。”



（王国维临终前写给学生谢国桢的扇面）

王国维所录这两首诗的第一首云：“生灭原知色即空，眼看倾国付东风。惊回绮梦憎啼鸟，冒入情丝奈网虫。雨里罗衾寒不寐，春阑金缕曲方终。返生香岂人间有，除奏通明问碧翁。流水前溪去不留，余香骀荡碧池头。燕衔鱼唼能相厚，泥污苔遮各有由。委蜕大难求净土，伤心最是近高楼。庇根枝叶繇来重，长夏阴成且少休。”

第二首云：“万古离怀增物色，几生愁绪溺风光。废城沃土肥春草，野渡空船荡夕阳。倚道向人多脉脉，为情困酒易恹恹。宦途弃掷须甘分，回避红尘是所长。无奈离肠易九回，强摅怀抱立高台。中华地向城边尽，外国云从岛上来。四叙有花长见雨，一冬无雪独闻雷。日宫紫气生冠冕，试望扶桑倦眼开。”



（王国维与宫内同僚们合照，照片中还有罗振玉、陈宝琛、郑孝胥、朱益藩等诸多名流）

## 赴死的从容



( 1927年，王国维自杀前在清华园的留影 )

金梁后来在《王忠愍公殉节记》中描述了王国维自沉之情景：“公晨起赴校，复雇车到颐和园，步至排云殿西鱼藻轩前，临流独立，尽纸烟一枚，园丁曾见之。忽闻有落水声，急往援起，不过一二分钟，早已气绝矣。时正巳正也。轩前水深才及腹，公跳下后，俯首就水始绝，故头足尽没水中，而背衣犹未尽濡湿也。

初众不知为公，及日午，见园门一车独留，谓待乘客未出，问其状相符，而家中人待公终日未归，问校中亦不知何往，唯车夫有见雇车至园者，其公子急往园，则园警适来访报，奔入省视，果公，已日暮矣。”

与此类似的是，王国维的儿子王贞明也曾经回忆：“父亲大人于前日八时至公事室，与平时无异。至

九时许，忽与旁人借洋三元。但此人身无现洋，故即借一五元之纸币。后即自雇一洋车，直到颐和园，购票入内。至佛香阁排云殿下之昆明湖旁，即投水。时离约四丈处有一清道夫，见有人投水，即刻亦跳入水，即救上岸。但虽未喝水，然已无气。入水中至多一分钟，亦未喝水，因年岁关系，故无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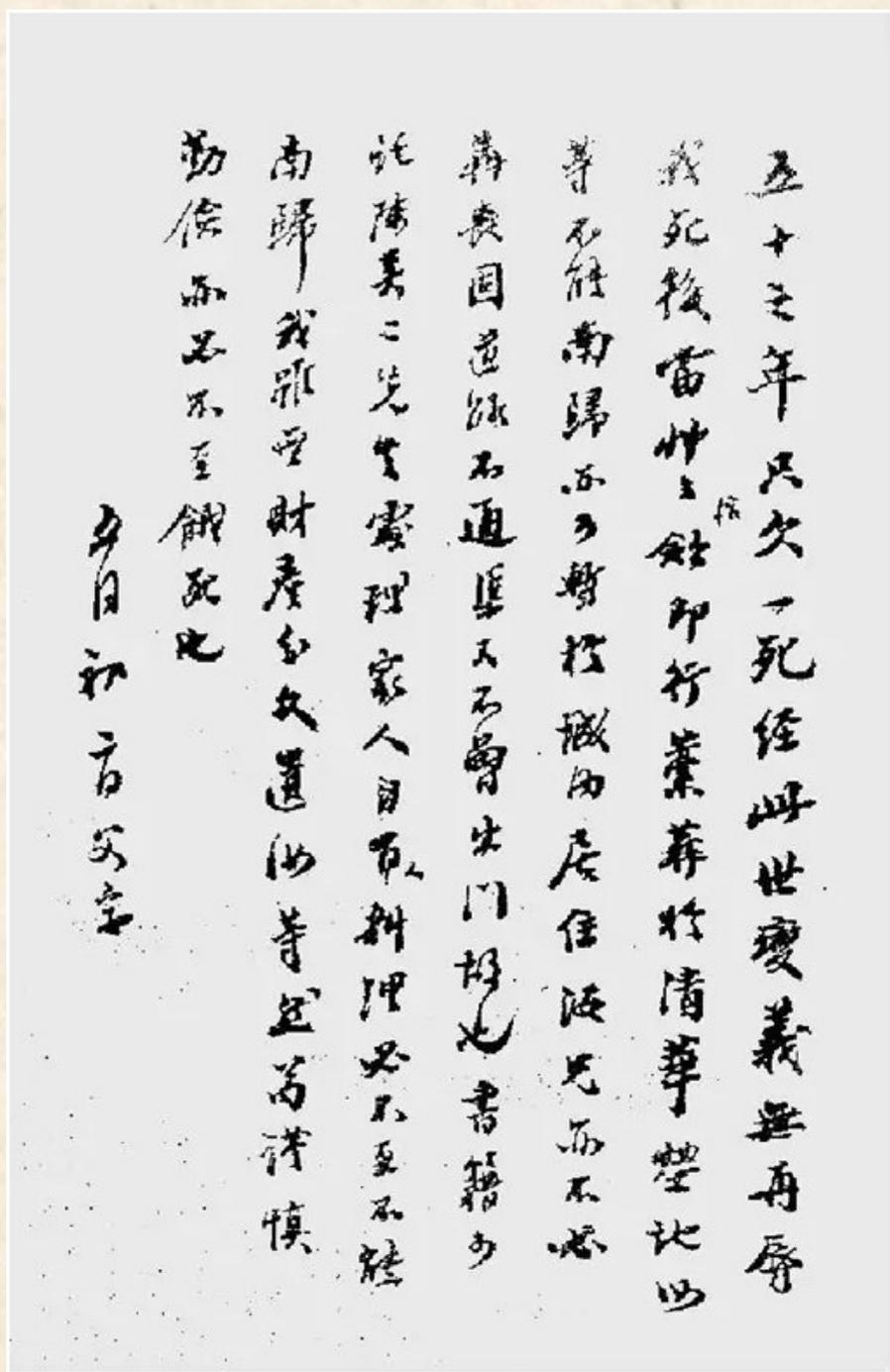
（王国维第二任妻子潘丽正（中）与三子王贞明（右）  
及夫人张霭云（左）合影）

王国维的学生刘节后来也有相同的回忆：“研究院办公处侯厚培先生为吾侪言：‘先生今早八时即到校，命院中听差往其私第取诸君成绩稿本，且共谈下学期招生事，甚久。言下，欲借洋二元，予即与以五元钞票一，即出办公室。’

据园丁云：‘先生约上午十点钟左右进园，初在石舫前兀坐久之，复步入鱼藻轩，吸纸烟。旋即闻投湖声，及得救，其间不及二分钟，而气已厌。死时里衣犹未湿也。’凡此皆事后得之贞明君转述者：盖先生年老，湖水虽浅，底皆污泥，入水时必头先触底，以至口鼻俱为泥土所塞，因之气窒。园丁不知急救术，以是

贻误而死。若使当时即以人工呼吸法营救，或能更生，亦未可知也……盖先生淹没已经二十余小时，面目紫胀，四肢拳曲，匍匐地上。”

王国维的遗书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槁葬于清华莹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陈寅恪）、吴（吴宓）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



（王国维遗书）

## 梁启超的哀悼

### 王国维终究只有自杀一途



(前排：李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  
后排：章昭煌、陆维钊、梁廷灿)

梁启超于九月二十日参加了王国维的葬礼，在王国维的墓前，对清华研究院诸生发表演讲指出，依欧洲人的眼光看来，自杀乃是怯弱的行为；基督教且认做一种罪恶。在中国却不如此，许多伟大的人物有时以自杀表现他的勇气。

梁启超进而援引孔子的“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欤”来形容王国维宁可不生活，不肯降辱；同时亦指出，王国维本可不死，只因既不能屈服社会，亦不能屈服于社会，所以终究要自杀。伯夷叔齐的志气，就是王静安先生的志气。这样的自杀，完全代表中国学者“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精神；不可以欧洲人的眼光去苛评乱解。

梁启超还分析了王国维的性格，认为王国维性格复杂而且矛盾：他的头脑很冷静，脾气很和平，情感很浓厚，只因有此三种矛盾的性格合并在一起，所以结果可以至于自杀。他对于社会，因为有冷静的头脑所以能看得很清楚；有和平的脾气，所以不能取激烈的反抗；有浓厚的情感，所以常常发生莫名的悲愤。积日既久，只有自杀之一途。

## 陈寅恪的感慨

### 王国维先生不得不死



（当时清华四大导师）

陈寅恪在挽诗中写道：“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赢得大清干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此处陈寅恪已经将王国维比喻成自沉汨

罗江的屈原，明确无误的认定王国维乃是殉清。

陈寅恪随后在写就的挽词中，集中表达了对于王国维之死的看法，并在挽词的序言中指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陈寅恪继而指出，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和希腊柏拉图所谓 Idea 者异曲同工，因此王国维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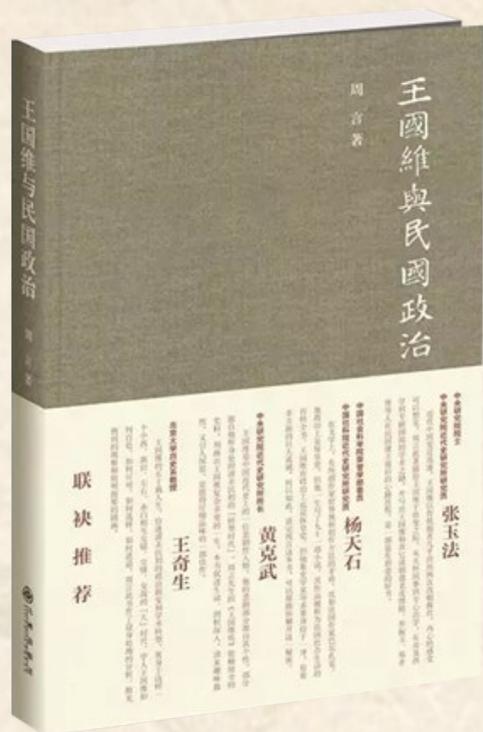
陈寅恪同时感慨，近数十年来，自道光开始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因为外族侵迫的原因，导致剧烈的变迁；因而纲纪之说无所依凭，今日乃是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因而王国维这样为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必然会与之共命而同尽，王国维先生所以不得不死。

JZHPRESS,悦读九州

本篇选摘自《王国维与民国政治》

周言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本书主要讲述了置身于那个中西、新旧、左右、赤白相互交错、交锋、交战的“转型时代”，王国维如何自处，如何应对，如何选择，如何进退，如何从“学术”走向了“社会”，最终成为与一九四九年之后的陈寅恪交相辉映的人物。

扫描下方二维码，阅读更多相关内容





##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 徐国能

有的时候，政治人物仍爱风雅一番，多年前两岸会谈，代表们用了“千里修书为一墙，让他三尺又何妨”来形容斤斤计较于现实争论的滑稽……

都说文学无用，古典文学似乎就更加无用了。有的时候，政治人物仍爱风雅一番，多年前两岸会谈，代表们用了“千里修书为一墙，让他三尺又何妨”来形容斤斤计较于现实争论的滑稽；又有废省前宋先生用了《红楼梦》里“机关算尽太聪明”来隐射政治斗争，近来则有苏县长说了“英雄多出屠狗辈”来况喻时事。



这些时候，古典文学，尤其是诗词里的含蓄、多义与简练等特色，似乎深深地契合了复杂的政治语言，这些介乎“有意无意”间的诗句，一来留下了许多诠释空间让传媒去猜测、去衍生说话者的底意，使说话者能够顺风驶舵，见势而为；二来也避免了对手抓住语病或是提起诽谤告诉的麻烦。

虽然我国自古有“断章取义”的习惯，或是“诵诗三百，授之以政”的实用传统，不过总觉得古典文学被运用在这些场合是有一点斯文扫地，毕竟文学如果只剩下了朝野间明枪暗箭的言语机锋，那么文学艺术里美

的要素势必将荡然无存了。因此如何在当代去留住那一份古典美,实有可思之处。

重新看了一九九九年白先勇的散文《树犹如此》,文中藉由园里的茶花与三棵柏树,写出了一段天长地久的友情,好友手栽的巨柏骤然枯萎,象征了一个坚毅生命的死亡,而满园茶花盛开,似也点染了作者在繁华世界里所独有的孤独情怀。



白先勇用“树犹如此”为题,语出辛稼轩的《水龙吟》:“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搵英雄泪”,而辛弃疾词中则是用了桓温北伐,见多年前栽在金城之柳皆已十围,而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故事。

白先勇《树犹如此》一文伏线千里,这一个题目竟也环扣了“流年风雨”、“手栽树木”与“人何以堪”等三个层面,分别表现在好友间的“成长相识”、“共治园圃”与“树亡人去”的人生经历,可以说是借古喻今,亦可以说是以今日之事,重新诠释了古典诗词的一番意境。



古典与现代的融合表现了作家对固有文化的深厚修养,也表现了对自我生命的深刻照见与现代语言的驾驭自然,这些都是值得为文者去揣摩的境界。不过,话说回来,观诸当前政治人物对于援古讽今的热中,也让我想起白居易写的《对酒》一诗,或许可以做为忧愁风雨的参政者之借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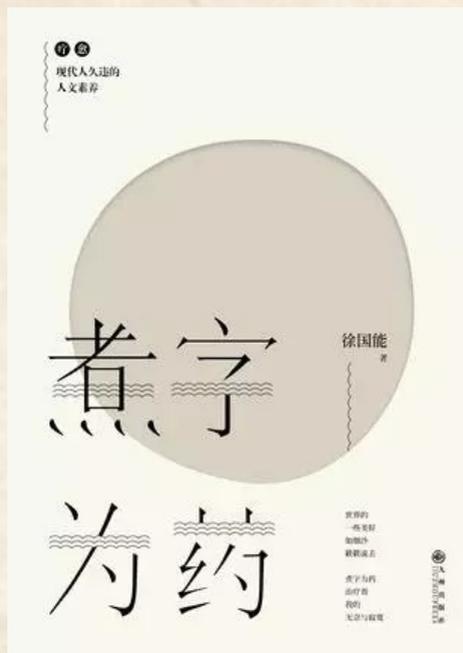
蜗牛角上争何事?  
石火光中寄此生。  
随富随贫且欢乐,  
不开口笑是痴人。

JZHPRESS,悦读九州

本文选摘自《煮字为药》

徐国能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 内容简介：

“无论古今，作诗搞文，也许都要细心慢火像熬汤炖药一般，提炼出字句的真淳，那么大凡诗文痼疾，无论是涕是痰，或许都可因此而愈吧！”

屡获各项文学大奖肯定的青年作家徐国能，深感国际化氛围下国人人文素养的悄然销蚀，在台湾《中国时报》开辟专栏，列举日常中俯拾皆是的中文应用，带领读者赏析素朴语文的个中深境，并略谈一些中文里特殊的字词或修辞方式，及探讨写作的种种问题。本书即是部分专栏文字的集结，文章深入浅出，笔淡情深，让读者发现中文的实用与乐趣，亦提供阅读的趣味与惊喜。

扫描下方二维码，阅读更多相关内容





主办:九州出版社

出刊:廿四节气,逢节气出刊

文字校审:@沧桑

数字出版:@朱国政

排版制作:@王浩鹏

文稿整理: @冯冯 @刘曦冉 @李永峰

统筹:@一木

【往期下载地址】



Copyright ©2015年

九州出版社《读·享|九州》

微信订阅号:jzhpress

Email:duxiangtuan@jiuzhoupress.com(投稿、入会)

企鹅:2635599399

小暑

